

守望 牧職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2398-1699 | info@hkci.org.hk / www.hkci.org.hk
第2期2020.11 ■ 督印人：龔立人 ■ 主筆：何嘉衡

02



守望
牧職

政治掛帥時代的 教育光景

何嘉衡
研究及出版幹事

自國安法實施後，很多香港政府政策以及行徑都變得「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官員們態度與去年反修例運動的時候一樣，完全不顧香港社會及國際觀感，似乎已因撕破了臉，所以香港政府不想再「偽裝」成一個國際都市的政府。香港各界因此或多或少都體會撲面而來的政治壓力，當中，教育界便是其中一個面對極大政治壓力的專業界別。自去年反修例運動開始，短短一年間，已經有不少關於教育界的新聞讓香港各界嘩然。當中包括有教育局向考評局施壓，使已完成的歷史科公開考試，有試題被取消，考試分數要有所調整。而出版社將教科書送審後，有大量內容更動，當中不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及公民教育。還有過往教育局向老師提供的基本法教材突然「被下架」；九月開學後，有天主教區學校的教材因涉及愛國內容而被質疑；最新近的新聞是有小學老師被指在課程內容中散佈港獨訊息而被終生釘牌。這些新聞讓人不禁質疑，現在的香港教育界是否已被視作政權的眼中釘，非得要「血洗」教育界？透過整

頓，甚至以媒體和校外人士批鬥老師，使教育界人士受壓噤聲，亦希望學生從此不再關心香港社會和作為公民參與香港社會事務。

一直以來，香港教會與香港教育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全港大約有四成中小學具有基督教背景，有不少宗派教會是辦學團體，甚至可能是全港規模數一數二的辦學團體，政府針對教育界的行動當然會影響到教會學校。作為辦學團體，教會應如何面對香港演變成愈發政治化的社會，特別是目前想要繼續「政教分離」的原則看似愈來愈困難（在此容讓筆者借用城市大學校長郭位非常有意思的話，他在拒絕加入「再出發聯盟」時提到，城市大學執行「教研合一、政教分離」的大方針，當中的「教」當然是指教育的「教」，而非宗教的「教」）。思考教會辦學以及與政府的關係，可能是接下來非常迫切的事。過往教會習慣了與政府密切的關係，也習慣了作為辦學團體為教會帶來的好處，但是接下來的日子，香港政府喜歡的「政治正確」和政府為香港各界劃下的紅線，一定會變得愈來愈多，愈來愈嚴密。除非撤離香港，不然以意識形態壓迫教育界以及影響辦學教會的日子總有一天會來臨。基督徒和教會要不要思考相關的問題，有沒有準備如何應對新時局、新環境？也許不會對目前的事態有立竿見影的幫助，但最少可以提早作一定的心理準備，使教會和基督徒更能面對將來的挑戰。

夾縫中的教育界

自去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後，在不少抗爭和表達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運動之中，都不難看到年輕的面孔。不少學校紛紛成立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關注組或組織，亦有中學生舉辦相關的活動以表達他們對政府推動修例的意見。相信最為人所知的是有不同中學的學生聯手舉辦人鏈活動，以表示他們反對修例的意見。根據《立場新聞》在今年4月的資料，反修例運動約一年下來，已有約7,800人被捕，當中有3,219名被捕者為學生，其中465人已被起

訴。這些被捕人士分別被控告不同的罪名：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傷人、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普通襲擊、縱火、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¹另外，理工大學被警方「攻打」的事件中，亦因為有為數不少的中學生參與，促使部分中學校長從中斡旋，希望能勸說他們離開理大校園，最後的確有部分學生聽從勸說離開。中學生之外，大學生也非常積極參與在反修例運動中，多間大學在去年年底都發生過「死守」與「圍攻」的事件，包括港大、中大、理大、浸大等。在多次抗爭中，亦有不少被捕人士是大學生，甚至有大學生在自己就讀的大學校園中被捕，被律政署控告暴動罪。從上述的事例均可見，相當多年輕學生積極參與在反修例運動中。這個現象令建制人士以及政府官員開始將矛頭指向特定的學科和教育界，例如開始指責通識科是使學生變得激進的「兇手」。中國黨媒與香港部分媒體亦配合相關論調，指香港教育界長期受反中份子影響，所以教導出不愛國的學生云云；甚至攻擊在反修例運動中被捕的教育界人士。

面對來自官員與建制派的攻擊和指控，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在目前的教育環境之中，老師根本不會進行所謂的「洗腦工作」。例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總幹事沈偉男以及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客席副教授梁恩榮均表示，按他們對目前教育工作的了解，學校老師基本上都會按專業守則來教導學生。例如通識科或其他與公民教育相關的課程，一個按專業守則工作的老師，必然會將不同的觀點都呈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了解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再教導他們思考和分析，學生經消化後始能得出個人自身的觀點與看法。這種綜合各方意見去思考 and 得出屬於個人結論和看法的方式，正正是通識教育課程希望學生能學習到的能力；所以通識課程公開考試亦要求學生能表現這種能力，亦會對此評分。因此，老師和通識教育課程被指責向學生進行洗腦教育，根本就是沒有根據的指

1. 〈反送中運動至三月中逾7,800人被捕809人無條件釋放 近廿人獲撤控〉，<https://tinyurl.com/y6inwzbp>，擷取自立場新聞，2020年10月23日。

控。梁恩榮更表示，有研究及以他了解的現實情況中，通識教育並不是如官員和官媒所指控的一樣，會讓學生變得激進。反而是在通識教育的過程中，學生能學習思考和消化不同角度的觀點，因而在面對社會爭議或議題時，會更為理性去思考問題；並且嘗試在不同的觀點之中，選擇自覺較為合理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學生並不會更為激進和以情感主導自身的行動，反而會因為理性思考而讓他們不會單憑情感行事，或容易被情緒化的說法鼓動。

沈偉男提到反修例運動爆發後，部分建制人士將修例運動的爆發原因歸咎教育界；因此老師們自反修例運動開始後，便面對很大的政治壓力，人人自危。既要擔心個人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論會被拿去大做文章，又要擔心失去在課程中與學生討論問題的空間；因為處處紅線，不知在什麼時候會踩中。顯而易見，政府和建制派認為只要學校範圍內沒有討論政治和社會議題的空間，學生就不會「被洗腦」，就沒有學生會走出來反對政府施政。不過目前筆者觀察到的是學校和老師很難作「煽動」和「洗腦」工作。的而且確，在寫作過程中好幾位受訪的現職老師們均期望學生能關心社會，但學生如何參與社會、以什麼形式表達意見，課堂上根本不會討論；年輕人和學生在反修例運動中的表現與教育界的關係其實不大。在反修例運動的過程中，學校和老師反而更像是政權與學生之間的「夾心餅乾」。一方面教育局和政府將年輕人參與反修例運動歸咎於學校與老師，不容許老師在任何地方表達其政治意見；也認為學生不應該參與任何社會活動，即便是和平表達意見的活動也不可以。但學生卻反過來覺得學校和老師對於反修例運動的態度不明確，因而自發舉辦行動並參與其中；以致學校往往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這種情況在2020年則有所改變，基於很多理由，例如疫情、社會運動因各種理由稍為降溫等，學校已經不是其中一個抗爭活動的空間，少了罷課、人鍊等抗爭或表達意見的行動。現職中學老師的張銳輝表示，他觀察到學生已經相對少在「學校」這場域中表達意見

和舉辦活動，甚至可能學生個人的參與亦有所減少。他提出了數個可能的理由，包括教育局真的以很多不同的方法要求學校阻止學生再表達對政治的意見，使學生很難再在校園範圍內作出什麼特別的舉動；疫情亦使得學生多數時候都在家裡上課，不需回校；還有學生其實也不只會考慮自己，他們會看到老師和學校面對壓力，為了不讓學校「難做」，可能也會自行選擇不再在學校的空間內表達意見。

教育界在抗爭運動的社會氛圍下，沒有一致的做法以處理學生的情緒與反應。不同學校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不過通常多以疏導和關心學生的情緒，還有關注他們的需要為主。接受筆者訪問的數位教育界人士，不論是否真正於學校內任教，都不約而同表示，不少學校老師其實都愛錫學生。雖然老師不一定會主動參與社會運動，但仍會關心學生會不會受社會運動困擾。很多時候學校和老師都會嘗試對受困擾的同學作出相應的輔導，例如張銳輝所任教的學校便在去年社會運動期間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因應事態發展作不同的應對工作。而他個人也曾得悉在某些衝突事件中，有他任教的學校學生參與。在那個過程中，除了擔心之外，他會盡全力嘗試保障學生安全；甚至因為這些經歷，與一些學生建立了更深切的關係。因為建立了信任，彼此可以更深入地對不同事情作更深入的交流與分享。過程中老師可能不會張揚自己採取了什麼行動，但的確有為數不少的人願意繼續默默工作，堅守崗位，持守專業，同時亦關注學生的身心狀態。

雖然教育界人士紛紛反對來自官員與媒體的指控，但是去年年底至今，仍然有不少老師被指責為「黃師」。有老師因被捕而收到教育局的警告或被無理解聘，亦有老師因為課程內容被媒體攻擊，甚至發生小學老師被指宣傳港獨而被終生除牌，令全港嘩然。事件發生後，媒體在採訪過程中才發現被指宣傳港獨的工作紙，是去年3月反修例運動之前就已經完成的課程工作紙。該名老師在使用工作

紙的時候，是先讓學生觀看香港電台相關的電視節目，再要求學生完成作業。而該節目的內容並非宣揚港獨，而是探討言論自由。更甚的是校方早已在去年6月完成校內調查，認為該老師所擬之工作紙內容和課程內容均沒有問題，但卻在一年之後的近日爆出該老師被終生除牌的消息。消息傳出後，教育局局長斬釘截鐵地說老師不能在學校宣揚港獨，特首更像是抓到教育界的把柄一樣，說要繼續抓出教育界內的害群之馬。但明顯從後來媒體報導上獲得的資訊可見，教育局是次的行動根本完全不合常理。因為既不符合「不追溯既往」原則，又不尊重學校內部的調查結果。整個行動似是為了符合某政治陣營的想像，想要形造教育界「反政府」、「不愛國」、「宣傳港獨」而製造事件一樣。

目前可見，教育界的確是面對來自政權和某政治陣營的攻擊。其攻擊的手段主要是針對教學內容及老師的個人言論，從上述提及的除牌事件已經可見一斑。除了直接攻擊老師教學的內容，目前亦有人會專門攻擊教育界人士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例如考评局評核發展部高級經理盧家耀，正因為在Facebook上的私人留言被抨擊，最後他選擇自行辭職。沈偉男表示以無中生有和斷章取義方式來針對教育界是很明顯的。在教學過程中一些過往不是很嚴重的問題都有可能被無限放大，甚至成為取消教師資格的理由。另外，老師在私人社交媒體上的言論也可能成為被批鬥的理由，教協在過往一年便跟進了不少個案。同時，沈偉男坦言目前教育界像其他行業一樣，在香港不整全的勞工法例下，很容易會出現剝削的情況。例如，近年不少合約老師正在面對此困境，當下的香港政治局面只是更加突顯這問題的嚴重性，合約制老師更容易會因為不同的理由而不獲續約。他也指出教育界和香港勞工法例這類型的結構性問題，並不是一時一刻可以解決的。沒有任何辦法能讓情況立刻變好，教協也只能盡量做好能做的事，例如為被無理解僱的老師發聲，讓社會知道有不公義的制度，以及盡可能在法律框架內為老師爭取合理

的權益。

除了針對老師，目前香港政府同時有計劃地針對教材作一定的動作。例如今年便發生了不同出版社的通識科教材在經過審核後，出現大幅被修改的情況；甚至是配合特定的政治宣傳和「政治正確」的說法，修改一些已經沿用多年的教材內容，像是把「三權分立」的字眼刪去，或是強行加入過往沒有的「大一統」說法。不然就是刪去容易引來爭議的內容，如「公民抗命」便是明顯的例子。沈偉男形容政府針對教材的行動其實並不新鮮，2014年雨傘運動後，教育局也曾經推出新教材取代舊教材，就是為了刪去部分政府覺得會導致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內容。而目前政府想以愛國教育取代過去公民教育的目的非常明顯，所以反修例運動爆發後，教材有更動並不意外，甚至連通識教育的內容其實也正在各方勢力的拉扯之中。不過，他指出通識科是目前香港公開考試的必修科，關係到整個公開考試的認受性和整套相關的行政配套。要作出更動，本來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會造成很大的社會成本，也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政府也不敢明目張膽，或是依從部分建制派的聲音，直接取消通識科或是將通識科變成非必修科。

被針對的通識教育

提到通識科，可能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教育議題是每逢香港發生大型社會運動，社會上都一定會有聲音指責並否定通識教育。毫無疑問，歷經了反修例運動，目前通識科老師應該是最能感到受政治壓力的一群老師。不過，如果了解香港教育的發展，可能會對建制派人士攻擊通識教育的舉措感到啼笑皆非。因為當日不顧反對聲音，在2000年前後強推通識教育改革的官員，正正是李國章和羅范椒芬，再加上特首董建華。這些人士絕非「反中亂港」人士，為什麼他們當日強推的通識教育，卻會在今天被指責（甚至是他們本人指責）是「反中亂港」的源頭呢？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香港的公民

教育發展說起。

回顧香港的公民教育發展，由於殖民地政府管治的需要，一直以來港英政府都不鼓勵和培養香港人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公民身分，只希望能培育守法而不多參與政治的「被動式公民」，不少論者都曾撰文論及香港公民教育的不足。² 要數港英時代最重要的公民教育發展，可能要回溯1996年才推出的公民教育指引。該指引首次提及民主、人權、法治、世界公民和國民身分等概念，特別是更正面地處理香港人的國族身分認同問題，可說是香港公民教育第一次「政治化」。³ 如果視1960年代強制小學義務教育為香港政府積極主導與影響香港教育之始，那麼卻一直要到1985年公布的《公民教育指引》，才是正式將「公民」的概念引入教育體制中。⁴ 甚至1996年推出的《公民教育指引》，才首次在香港教育體制內提及政治內容，可算是相當緩慢的發展。不過，指引歸指引，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要求學校必須跟從指引來開設科目。⁵ 就算學校自行開設學科，也不難發現教學內容也是相當保守的⁶，所以香港的公民教育內容遠遠落後於很多亞洲其他地區。1996年的公民教育指引雖然是相對開放及拉近了與世界其他地區公民的教育水平，但2001年特區政府推動教改，又開始將德育在公民教育內的分量加重，並突出國民身分認同，在港英時代後期推動的世界公民身分彷彿又變得不再重要。⁷ 梁恩榮形容，若老師是依從2001年的指引來設計課程，

2. 例如梁恩榮、劉傑輝著《政治教育在香港：理論與實踐》、由單文經、陳耀任、洪泉湖著的《香港公民教育的歷史發展與重要問題》、梁恩榮、阮衛華著《公民教育，香港再造！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等書和論文，當中不少都有回顧香港公民教育發展的過程與歷史，當中均會提及港英時代的公民教育轉變，最大的轉變可謂由80年代開始要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而出現，港英政府自那時開始，才比較積極地培養香港人的公民意識，鼓勵人參與政治事務或組織壓力團體，甚至組織政黨以參與政治，香港人才算是慢慢成為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

3. 梁恩榮、阮衛華：《公民教育，香港再造！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香港：印象文字、香港基督學會：2011），P.77-79。

4. 1985年的公民教育指引並沒有太多政治相關的內容，而多是個人品格與人際關係等內容而遭到詬病。

5. 當然，不同中學會有不同的情況，學生的能力又會有所不同，但例如筆者畢業之中學便沒有獨立成科的公民科，只有每學年一次的公民教育周，學生甚至可以選擇不參與相關課後活動，現在回顧自身的經驗，就讀該校又能於中學時代就開始關注社會事務的同學，實在相當稀少。

6. 單文經、陳耀任、洪泉湖著的《香港公民教育的歷史發展與重要問題》，P.3，擷取自<https://kenzenchen.files.wordpress.com/2009/04/cb20041.pdf>，2020年11月2日上午11時。

7. 政府於2001年推出名為《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課程文件，在該文件中有關於德育教育的部份變多，而1996年指引提到的世界公民部份則是被淡化。

完全可以偏重德育的部分而略過討論香港政治和社會議題，彷彿公民教育又重新回到港英政府「非政治化」的時代，不希望學生多接觸和思考政治；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2009年，當通識科出現才被打破。梁恩榮表示，政府設計通識科的本意當然不是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只是希望提高學生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讓他們有能力回應全球化的發展潮流，所以才會重點培養學生的九大共通能力（包括：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明辨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習能力）。政府發布的《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⁸裡有提到「通識教育科讓學生探討的課題，涉及不同處境下的人類境況，藉此幫助學生理解現今世界的狀況及其多元化特質。本科旨在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聯繫各科的知識，能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題，從而建構與他們所身處的現今世界直接相關的個人知識。本科的獨特性在於培養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和跨學科思考技能。」⁹ 雖然如此，但是梁恩榮認為當年教改的主要目的集中在培養學生日後可能與經濟發展有關的能力¹⁰，例如培養學生的創意主要也是為了日後的職場發展，而不是打算透過教改和通識科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既然如此，為何到了今天，不分黃藍陣營都認為通識科有助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甚至有人認為通識科反中亂港？

正如前述，通識科是政府希望培養學生面對全球化時代的能力而設計的學科，當中包括了自行研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亦包括了認識世界和學生所處之城市（香港）的內容，希望學生能了解世界，又能立足香港，發揮香港的優勢，在全球化時代裡與世界各地的青年競步。另外，日新月異的科技及各類型技術發展，令學生已

8.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2007（2014年更新），擷取自https://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vLS%20C&A%20Guide_updated_c.pdf，2020年11月2日下午1時。

9. 同注8，P.2。

10. 這想法，也許可以以《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裡提到的「通識教育科旨在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正面的價值觀與積極的態度、社會觸覺和適應能力，為將來升學、就業和擁有充實的生活作好準備。」作為某種引證，同注8，P.3。

經不能像過往父母一輩，能靠著在學校學到的知識，輕鬆應對日後的職場需要。所以當時教育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是要讓學生學會自行進行課題的研習，也能應用學習到的收集、分析、歸納資料等技巧，以適應日後的知識型社會發展。這些技巧與能力，本來都與公民意識和公民行動完全無關，但正如梁恩榮所言，這些分析和應用資訊的技巧，不可能只是考試或工作技巧，當一些有能力的學生學習到這些技巧，自然就能夠應用在不同方面，包括思考和分析當前的社會問題之上。再加上，其實一直以來教育界，又或是說其實不少社會人士都會對年輕人有所期許，希望他們能關心社會，為改變社會而努力；所以或多或少老師們都會鼓勵學生多了解香港社會正處於什麼狀態，有什麼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當學生掌握了一一自行尋找研究課題及相關資料、理性分析的方式、小組合作的能力、創造力等不同的能力後，要在什麼範疇運用這些透過通識科學習到的能力，本來就是學生們自己的選擇。加上社會有意無意鼓勵學生了解和參與社會事務，所以就算通識科沒有特別要為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就客觀結果而言，通識科的確對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和參與社會運動的能力。也許對於某些陣營人士而言，可能這好幾個因素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他們口中的「學生被洗腦變得激進」和「不愛中國不愛黨」，但這絕非是教育界的問題。單單針對教育界，指責他們洗腦學生，實在相當不公。

在目前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能慶幸的是通識科的地位短期內都難以撼動。正如上述提及一樣，由於通識科是必修科，而且整套公開考試的制度已經運作一段時間，所以若是要在一、兩年內作非常大的更動，一定會牽涉到出版商、考試評核、師資培訓、學校行政等各方面的範疇；社會一定會對政府的動作有更多質疑聲音（雖然現在的香港政府會不會聽社會意見也很值得商榷）。不過，更重要的是，通識科的更動可能會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例如直接取消或是以其他科目代替通識科，便會使出版商需要

在短時間內進行大量的編修工作，直接影響他們的利潤。又例如大學好不容易才慢慢適應如何教育新學制的學生，若突然又要修改，甚至將部分學生應在中學時已經學習到的知識與技巧「閹割」，勢必又會再使高等教育界被迫站到反對政府的立場之上。若是勢利眼一點去考慮，通識科在成為公開試的一部分那刻開始，不同的商人就早已投入市場之中，例如通識科的參考書、應試技巧、課外讀物，甚至補習社也早已牽涉其中。全香港應屆公開試考生這龐大的市場，大概也成為了投鼠忌器的理由。所以可見雖然建制中人曾經豪言應取消通識科，但是目前政府的做法，其實仍然是以保有通識科為前題，進行不同程度的清洗；希望能達致「使學生不再被黃師洗腦」、「不會上街抗爭」等目標。

在通識科被針對和目前香港的政治情況下，筆者訪問的幾位相關人士均表示，教通識的老師會感受到壓力。現役任教通識的梁永達老師便提到，在國安法之下教通識，確實有壓力，因為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個建制組織與個人，都有針對和指責通識科「教壞」學生。另外亦有情況是，家長或學生向校方或者政府部門投訴或指責老師，所以老師們的警覺性會提高是必然的。在課堂上，教師會更留意自己有否呈現多元觀點，例如讓學生了解政府和建制派的觀點。不過梁永達提到，他個人而言，壓力之下仍會持守自己的原則。如果是過往教學中有提到的重要觀點與看法，在今後也會繼續呈現在學生面前，不會劃地為牢，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先為自己的講課內容劃下紅線。由於受疫情影響，有一段時間所有學校都要改成網上授課，於是有家長或其他有心人士可以透過網絡得悉老師講課內容，這可能也是老師要擔心的事情。不過幾位受訪者均認為，一般而言老師的教學都非常專業，如果出現老師被投訴的事，可能在調查的過程就已經可以還老師清白；又或者可以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為遭到不公平對待的老師追回公道。只是這過程往往會很漫長，假如被無理解聘的老師是合約制老師的話，要追討合理的對

待會比一般老師困難。然而這些教育界人士接受筆者訪問的時候，宣道小學老師被解僱事件仍未發生，所以現在回看他們的回應，感覺他們還是過於樂觀以及信任現行機制。相信沒多少人會料到政府能在已經經過校內調查的事件上做文章，甚至連該校校長、科主任等人都要被追究責任；這實在是香港已經禮崩樂壞的具體表現。在這種情況下，本學期開學至今仍未有通識科老師被政府針對的新聞傳出，不代表大家可以放心；這可能只是某種政權仍未找到藉口繼續清算而換取的平靜。

當教會遇上高度政治化社會

至於作為辦學團體的教會，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會不會採取什麼行動，有沒有作什麼特別的準備？筆者曾訪問一個有在香港辦學的宗派牧者，對方表示宗派內部暫時沒有對國安法有特別的措施和準備。他說在目前的疫情下繼續教育工作的安排，已經佔據了學校行政體系的大部分注意力；該宗派作為辦學團體，暫時沒有時間討論特別的指引，以安排應對目前的政治事件和國安法。因此旗下的學校也相應沒有任何特別安排。與該宗派比較，天主教區的動作似乎就快得多。除了在今年暑假前後有傳媒發現天主教區有學校的德育課程教材，似乎作了部分更動，顯得相當確定「愛國」這品德。天主教區早在今年八月初就已經向旗下中小學發信，要求要教導學生認識國安法、防範校園政治化，更向學校發表備忘，要求學生身穿校服參與校外活動須獲學校批准；這些舉動被不少人視作天主教區選擇「跪低」的表現。相當諷刺的插曲可能是，該則關於天主教區對學校發出備忘的消息，是於筆者訪問本地某基督宗派牧者之後沒多久傳出來的消息。記得在訪問過程中，該位牧者還跟筆者表示，辦學團體或學校其實也很難對學生的行動作出太多規範。當時也沒聽聞教育局有向任何辦學團體和學校施壓。

以筆者的觀察，由於教會辦學實在能得到不少「好處」，例如

可以在星期日使用學校場地進行崇拜，又可以在校內辦團契、安排聖經課等，而且推動年輕人及家長的宣教工作會比較容易。所以教會除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迎接香港回歸時有討論過若出現政權打壓教會，教會要如何應對之外，一早已經把類似的問題放下至今。在今時今日的政治局面下，基督徒應該要開始居安思危，思考在接下來從來沒有香港人經歷過的時局中，若教會仍要繼續舊日的服務或宣教方式，將可能面對什麼風險；教會各範疇的工作會否被干預，或是會否需要符合某些來自政權的要求才能繼續以往的宣教模式等等。當然，過往教會作為辦學團體對於校政的影響，其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衝擊，主要是因為政府推動校本條例，規定了每間中小學均要成立法團校董會，加入由選舉產生的家長、教師及校友代表。辦學團體所委任的代表最多只佔法團校董會的六成，天主教區、聖公會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都曾表示反對，擔心辦學團體對校政的決策權會被「稀釋」，甚至有可能會被「奪走」，並因此曾與政府對簿公堂，但最終敗訴；因此要按規定成立法團校董會。政府推動校本條例時，其實就只有上述三個宗教團體表示反對，其他辦學團體要不是支持，就是沒有表達意見。這是不是代表了不少辦學團體其實對能否完全貫徹辦學理念沒有太多想法，又或者可能根本沒想過那是一種會削弱辦學團體對校政影響力的做法。

在目前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下，筆者認為教會絕不能掉以輕心，要隨時提高警覺，亦要持守自身的辦學信念，絕不能因辦學帶來的好處而讓步。雖然，一直以來包括辦學在內的社會服務，都是香港教會對社會很重要的貢獻；但在目前的局勢下教會為要能面對目前或日後可能發生的狀況，應早於最壞的政治情況（甚至可能是迫害）來臨前，便開始思考教會所能接受的最底線。若某些來自政權的要求越過這底線，教會就應該考慮停止與政權合作，不然很可能會成為壓迫他者的幫兇。這原則大概適用於各教會與政府合作的範圍，包括教育辦學方面。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或許現在正是考驗教會領袖的政治智慧、判斷力和應變力的時候。只是筆者暫時仍未看到主流教會宗派內部有類似的思考與討論，可能就是曾訪問過的宗派教會牧者所表示的一樣，目前反反覆覆的疫情已經很大程度上使得教會疲於應對。大多數教會在疫情中要轉變多年習以為常的做法，亦需要摸索新的崇拜與教會生活方式；單是眼前疫情威脅已經將教會的注意力全部吸引過去，要教會領袖馬上騰出空間來思索更遠將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也許有一定難度。也許要目前的香港教會想像有一天教會被迫害，例如不能寫「基督」，要寫成"JD"；未成年兒童不能參與任何宗教活動等情況，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又或是這些想像是多餘的，將來根本沒有發生任何對教會的打壓，但能預先作好一定心理準備和應變計劃一定不會是多餘的。關於教會辦學以及目前政府津貼教育辦學的模式，實在有非常多可以討論的空間以及思考。在看到香港各個界別都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時，特別是在教會有直接參與其中的教育界正受到不同程度的攻擊，繼續以為教會能置身事外是不合時宜的，因為除了政權會留意教會表態，社會各界亦會密切留意教會在這亂世中的選擇。例如天主教會香港教區發給學校的指引就被媒體廣泛報導，並引來不少人批評教區。先不論各個作為辦學團體的教會對目前香港政治到底有何看法，教會對政治問題的態度或表態會引來什麼人士的抨擊，以及那些抨擊合理與否，在這亂世之中及早思考和討論教會辦學的角色（甚或提供其他社會服務的角色），對於日後教會應對時局轉變會有一定的幫助。也許現在才是香港教會真正要思考如何實踐「政教分離」（不論是教會的「教」或是教育的「教」）的開端。

亂世中的教育空間與可能

正如梁恩榮曾在多次公開訪問中提到，若老師不想淪為「造假的老師」，包括只在課堂上教授政權希望人們所知道的內容，不能誠實地呈現事物和事件的不同面向；在私人空餘時間，不能發表

自己對事物的看法，擔心會因此被公開批鬥；最重要的是讓學生也像老師們一樣，成為不能講真話，不能誠實地對待社會正在發生之事的人；那麼老師們最基本要做的就是「講真話」，不能順從政權希望的「政治正確」。要達到這樣的目標，老師必然要持守專業，像是通識科老師要能在課堂上讓學生接觸到不同的觀點與看法，並且教導他們如何思考及判斷，最後在自己的思考過程中得出屬於自己的看法，這才不是洗腦教育；而是一種教導學生如何思考和判斷的過程。筆者相信人必須要經歷這樣的過程，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所思所想的理念與做法，並且為此而負責，成為能對自己，也能對他人負責的「公共人」。當然，在目前的局面下，老師要做到持守專業可能是不容易的事，因為很容易就會觸及政權的政治正確紅線，又或是讓教育「非政治化」的做法，使得老師無可避免要面對來自政權的壓力。政權讓教育「非政治化」也可能會讓一些有理想，希望學生能多參與社會事務，能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老師們感到痛苦。畢竟睡醒的人必然會知道自己正處於火場之中，就只有還在沉睡，又或是在裝睡的人才會覺得自己處於安全的環境之中。這樣的局面對於作為辦學團體的教會來說，也定必是挑戰。教會能否支持其所開辦的學校裡的老師持守公義和真實？能否不跟隨政權喜歡的「政治正確」起舞？只依從來自上主的呼召和價值教育下一代人？能否以事實和專業來衡量老師的工作表現？這些都定必是教會在未來需要思考和面對的問題。受訪的張銳輝老師認為，在目前這種政府對反對者抱持敵意的態度，甚至社會開始有舉報風氣之下，他自己會在教學和準備教材的時候更為小心。雖然不希望在教育過程中有自我審查，不過真的會比以往更著跡地多元呈現對任何事件的每個觀點與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如果在教育過程中有「跟足」專業守則，就算被針對甚至批鬥，仍有其他社會大眾會還老師們一個公道。張銳輝直言現在在教育過程中的確會有壓力，但他仍然覺得要尊重學生的選擇，亦仍然期望學生能在這環境中關心和認知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最終學生會採取什麼方式來回應及表達，都絕對不

會覺得他們是在「搞事」，因為他認為年輕人才是社會的未來，「大人們」沒法為他們決定未來。

若果再深入討論教育問題，或許在這個時代裡，仍然身處在香港，希望事情仍有一點轉變的人們應該要開始思考教育模式的轉變。筆者會提出這個說法，是因為目前觀察可見，香港政府只會逐步收縮教師在由政府資助辦學的學校裡的言論自由、教學自由，甚至可能會要求老師配合，只教導學生一些政府希望學生知道的所謂「事實」和「品行」，例如要愛國，要配合政府施政，要維持社會和諧穩定等等。這正是上述梁恩榮提過的「造假教育」的形態，與一直以來很多人希望教育能使學生學會獨立思考、分析、判斷、成為關心社會的公民等有很大分別。在這種政治目的掛帥並且大於一切的情況下，由政府資助的教育只會慢慢淪為一種社會控制工具，難以培養一般政治理想中，會關心社會，持續追求社會改進與公義的「公民」。因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早已將政府希望的社會控制思考模式內化為他們對事情的判斷與看法，很難跳出思維的框架去質疑社會不公，反思政府施政等問題。目前，看似香港教育「造假化」是無可避免的事。但若不想這種造假教育全面控制香港的下一代，那麼另覓教育空間培育公民，用以平衡或淡化造假教育的影響，就是非常迫切的事。

隨著香港教育發展，政府定立法律規定適齡學童必須接受義務教育後，香港人對教育的想像，很多時就被「六年小學、六／七年中學」的框架所規範。在筆者寫作本期《守望牧職》時，也明顯受到這種思考框架限制了想像，直到別人提點，才發現目前大眾在討論政治問題如何影響香港教育，很多時候焦點都只落在津貼學校和大學之上，並嘗試在日益劣化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之中，悍衛以往大家習慣的專業教育空間。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可能就如筆者曾提及的一樣，教育界的遭遇可能會每況愈下，又或是某些特定科目老師會更多遭到攻擊和不合理對待。除非香港的政治環境有所轉變，

不然前景悲觀是可預期的。有能力讓子女往海外接受教育，或者自己都想離開香港的人大可不需要再想像其他可能，但對於仍然身處香港的港人而言，難道就只能眼看公民社會因為教育退步而萎靡不振？是不是應該要開始思考更多的空間和可能？筆者目前想到的突破方法例如有民間教室、網上課程，甚至教會主日學也可以是其中的一種。

香港特區政府借用港英殖民地時期的法律來整頓不欲其發展的私人學院不是「新事」，最為人所知的例子有2014年雨傘運動後曾出現的「香港民間學院」。香港民間學院是一群不同範疇的學者和研究者共同成立的，並提供收費課程予學員的私人學術團體，當中課程主要與香港公民社會及公共議題相關。後來該組織收到教育局的警告信，勒令必須停辦學院，不然將面臨罰款與監禁。¹¹以教育條例規範「學術」，容許政府上下其手，甚至限制其所不願看到的學術機構或組織發展，這是上述提及在港英時代已經有的做法。可以說，在民間學院被警告而停辦的例子中，香港政府也只是沿用相關做法「對付」其所不願見到的學術機構。不過，在目前形勢之中，不難看到主流教育機構在將來一段時間中，必然會受到愈來愈多掣肘，過往強調學術自由的大學也早已受到影響。¹²民間能否以自己的方法繼續過往的學術自由風氣，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繼續一些政府不認可、不接受、不資助的公共議題研究，可能是往後仍舊選擇留在香港的學術人其中的一大課題。目前在香港自發的研究團體，例如「本土研究社」，在一定程度上有自主推動一些關於香港本土議題的研究。可以看到這些年來本土研究社在檔案解讀、地圖閱讀等等方面，如何加深香港人對香港的理解。¹³可預見在實體空

11. 〈民間辦學知識有罪？辦學先驅許寶強：前路只能探索有限空間〉：明周文化，2017年4月21日，擷取自<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6%9c%ac%e5%9c%9f%e7%a0%94%e7%a9%b6%e7%a4%be-%e6%b0%91%e9%96%93%e8%be%a6%e5%ad%b8-%e6%b5%81%e5%8b%95%e5%85%b1%e5%ad%b8%e8%aa%b2%e5%ae%a4-30491>，2020年11月2日下午1時。

12. 先不論目前的大學環境如何，有沒有黨委加入大學校園等等，光是戴耀廷被香港大學解聘，相信對很多人來說就已經是一個學術自由已死的象徵。

13. 無獨有偶，本土研究社正好亦是受警告而停止活動的民間學院的籌辦組織之一。

間舉辦的學院或學校，一定繼續會受到法例上很大的掣肘，但歷經肺炎疫情，香港人大多早已習慣在網上空間繼續工作或學習。未來民間辦學機構若希望能找到一片空間，網絡應該是其中一個可能。日後在這民間教育的空間之中，或許仍能討論一些「政治不正確」¹⁴的議題，包括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香港政制如何能夠更進一步改進等。¹⁵

又或者，教會和基督徒有沒有思考過教會也可以是一個民間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空間？教會行之多年的主日學，本來就是教會主動培育會友的空間，例如除了兒童主日學，也多了成人主日學，以提供機會讓會友進深對聖經、神學、教會歷史的理解。這些空間與時間若是用於教導會友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和基督徒，如何能在威權下面對不同的處境和壓迫，在亂世中學習如何互相支撐等，也可以是不錯的選擇。其實，目前已經有些團體和組織在教會以外自行開展了相關的事工，大多時候這些組織都是邀請講員來就特定或當下受關注的議題開設講座。雖然也可以達到一定教育目的，但是這種類型講座所能探討的議題，往往會因為時間問題而不會很深入，與一般而言的教育場景與空間還是有一段距離。筆者認為教會可以在這方面負擔起更多工作，因為教會本來就有實踐教育的「功能」、體制和成員。這些新型態的教導工作，可能未必能讓教會即時得到好處，但誰知道會否有一天，教會所培養出來的公民，會在教會危難的時候發聲及作出實際行動保護教會？¹⁶

此外，教會在辦學時理應也要開始重新思考到底教會為何要辦學，是否只是為了得到辦學所帶來的好處？還是希望透過教育使

14. 有時候政治正確與否，並非由人們決定，而是由擁有權力的人決定，所以不要懷疑筆者為什麼會將一些現在仍有人覺得是很平常，很普通的議題當成是政治不正確的議題。

15. 當然，在目前香港政府管治下，任何被其認為是「反政府」的組織有現金流，都可視之為「洗黑錢」，並且落案起訴，例如資助社運人士訴訟的「星火」，乃至剛剛因國安法被捕的前學生動源召集人羅翰林都被指控洗黑錢，若日後民間教室等機構希望補貼教師一點教學費用，應該也要非常小心。

16. 畢竟，如果認真觀察歷史，教會往往會成為極權政權針對的對象，要麼就是完全迎合對方的要求，要麼就是只有微小的異議也會遭到嚴厲打壓。以目前香港的局勢發展，真的難以估計某些過往不會發生在香港的迫害，會不會有日在香港上演。

基督教精神能影響教會學校的學童，甚至他們的家庭，而教會又有沒有希望學生們能成為能獨立思考又能盡社會責任的好公民？如果只是希望能在辦學的同時可以借用學校空間成立教會，教會的確只需要繼續維持現有的模式。若教會是希望可以實現前者，基督徒和教會就應該要開始想像和思考在威權時代中，教會學校到底要培養學生有什麼品德，要否教育他們擇善固執，要否讓他們看到在亂世中，基督教學校會是一個良好的榜樣，會教育他們成為一個良善的人等等。對於基督教教育的堅持不是一天可以突然「蹦」出來的，教會必須要提早作出思考，甚至可能要教導會友、學校成員和學生，讓他們明白基督教教育的精神和目標，並在亂世中踐行基督信仰。

2020年是比2019年更風起雲湧的一年，轉瞬間發生了很多讓人措手不及的事，甚至將過往人們對「日常」的認知完全打破。在這種時局中，不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其實都應該要有覺悟。除非國際局勢有非常重大的轉變，導致某些政權喪失影響香港的能力，不然香港已經無法回到過去的「習以為常」之中。不論是已被點名針對的教育界，還是部分人已被左派報紙，甚至官媒批評的基督教界，其實都應該有心理準備，接下來的日子會愈來愈難過。教會作為教育界其中一個重要的持份者，是否應該開始思考、想像、籌備去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轉變？又或者，香港的教會和教育界有沒有意識到，更壞的情況都還未出現，現在的平靜只是暴風雨來臨前夕的寧靜？如果沒有，希望這次的《守望牧職》能給予讀者一點少少的「靈光」，讓大家都開始好好思考教會以及教育界將來可能會面對的景況。也許這樣在面對極為強大的極權政府可能是於事無補，但總比在完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被殺得措手不及為好。

鳴謝受訪者：梁恩榮、張銳輝、梁永達、吳有能、沈偉男、蒲錦昌。

《守望牧職》是新計劃「守望牧職」的其中一種實踐。事緣在「反送中」過程中，學會除了直接參與外，也思考如何支援教牧同工反思他們在社會的角色。就此，我們定下幾個目的：第一，為教牧同工提供對社會事件有厚度的認識，特別是神學和基督徒參與；第二，組織和推動教會與社區對話，甚至尋找合作可能；第三，探討不同教會的社會參與個案，豐富對牧職的想像。《守望牧職》正是以文字來實踐這三個目的。

因疫情緣故，其他實踐計劃將稍後落實。

學會每年財赤達五十萬，但沒有影響我們放慢使命。我們仍努力投入建立一個讓人有尊嚴的社會，並支援教會回應上主的使命。我們需要你們的同行。你們一句打氣的話、一點金錢的捐助是我們動力之一。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 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Ltd.

請將劃線支票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寄往本會地址，或直接存入支票並通知本會。

- 銀行入賬 — 香港匯豐銀行，戶口號碼：196-035927-001。

請將入數紙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透過whatsapp (93520864)、電郵或傳真通知本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 9/F 901室

電話：(852) 2398 1699 | 傳真：(852) 2787 4765 | 電郵：info@hkci.org.hk

凡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捐款收據申請減免稅款。

「人生而無知，但是並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

—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